

抗日戰爭

胡從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章伯鈞 莊建平 主編

章伯鋒 庄建平 主編

抗日戰爭

胡繩署



●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三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 历史 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一九九七年·成都

· 抗日战争 ·

章伯锋 庄建平 主编

第四卷

(上)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

本卷主编 陶文钊

编者 王建朗 杨奎松 李嘉谷
齐福霖 葛夫平 陶文钊

前 言



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日战争占有独特的地位。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又相当特殊的时期。

纵观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外关系,“五四”运动是一个大的分界。在此之前,列强把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逼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这是一个沉沦的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欧亚各地普遍的民族觉醒的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觉醒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问题上。从此,中国中止了在对外交涉中不断失地、赔款、让与利益的过程,而开始了缓慢的逐渐收回利权过程。在 20 年代,中国与一些国家订立条约,收回了胶州租借地和一批租界,订立了收回威海英租借地的条约,实现了关税自主,并与有关国家进行了废止在华领事

裁判权的谈判。总之,中国对外关系开始上升。^①自然,这种上升是缓慢的,曲折的,不是迅速的,直线的,甚至还有大的反复,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但正是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了空前的觉醒,中国的对外关系也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二次大战的主要盟国和东方战线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中国是亚洲抗击日本的惟一大国。由于中国这时已独立进行了四年半艰苦卓绝的抵抗,由于中国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逐渐取得了大国地位,这主要表现在1942年1月1日领衔签署《联合国国家宣言》、1943年10月签字的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1月参加开罗会议和签字的《开罗宣言》、1944年10月参加筹备组织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及1945年4—6月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与前此近一个世纪的关系有很大不同。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英、美、日、俄、德、法六大国的关系情况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说(不是所有时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六大国是侵略压迫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大国,中国是被侵略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有时候是这些大国中的某一国或某两国对中国发动战争,进行侵夺,有时候是这些大国联手对付中国。这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没有区别,或者说,这些国家彼此之间没有矛盾。恰恰相反,由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历史发展、自身的力量情况各不相同,由于地缘政治学的原因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它们的对华政策及其实践是各不相同的,它们彼此之间也是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但是当中国面临某一、二大国的侵夺而处于危急境地时,没有一个大国站在中国一边,从道义和

^① 参见张振鹗:《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物质上援助中国,它们或者听任别的大国对中国的宰割,尤有甚者,自己趁火打劫,攫取利益。一次大战后,情况有所变化,德国战败,中德之间以前的不平等条约废止了;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苏俄及以后的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平等条约。此后,中德、中俄(苏)关系可以认为是平等或基本平等的。但就中国与英、美、法、日之间的关系而言,情况基本没有变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且威胁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亚洲的利益。战前,在中国实业利益最大的国家是英国与日本。英国在华经营多年,基础牢固,力量雄厚;日本势力发展迅猛,咄咄逼人。从19世纪末以来,美、日两国就在亚太地区进行激烈竞争,美国主要为了保证菲律宾的安全,不得不对日本连连让步,基本上听凭日本在亚洲大陆进行扩张,直到1922年召开华盛顿会议,美国才得以联合欧洲列强,把日本的这种扩张势头遏制住。从根本上说,英日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且准备伺机“南进”,使美日、英日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美、英在经过一阵犹豫动摇后开始援华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正式结盟,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苏联则在抗战前期大力援助中国。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赢得如此广泛的国际支持,这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起源的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讲,外交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指一个国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政府与其他国家的这样的政府进行交往的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显然还没有建立这样的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国情。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在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迅速开辟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各解放区的政权,名义上隶属于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但实际上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些政权看起来是各自独立的,解放区没

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但实际上,中共的组织和政策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新中国的雏型^①。既然如此,中共自然要考虑对外交往的问题,我们讨论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也就是恰当的了。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就设立了外交人民委员会,只不过,中共当时事实上并未与任何国家的政府进行交往,其外交政策实际只是国际革命政策。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外部世界交往增多,这里有外国(主要是美国)记者、学者、军人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解放区的访问,有中共驻重庆代表与美、英使领人员的接触,直至发展到美国陆军部向延安派出观察组,与中共建立半官方的联系。中共方面的外交意图主要是:让外部世界如实地了解中共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敌后根据地,在国际上树立中共的新形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争取在亚太地区有利益的各国援华抗日,反对国际上的对日妥协倾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争取运用外国(主要是美国)影响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防止战后爆发内战。中共这种民间的、半官方的外交活动构成中国这一时期外交关系的重要方面。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内容极其丰富,情况相当复杂。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将冲突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战争。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日双方从各自利益考虑,都没有公开宣战,这场战争不宣而战地进行了四年半之久,这在近代战争史上确是罕见的。其

^① 参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间,日本政府为劝诱国民政府投降,发起了一系列的“和平工作”,这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主要内容。

德国是在欧洲发动战争的主要法西斯国家,它与日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德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支持日本侵华。在战争爆发前,中德关系相当密切,在中国 30 年代建立军事工业和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中,德国起了突出的作用。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认为日本背离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既定目标,认为日本侵华只会把中国赶到苏联一边,日本自身将受到削弱,难以发挥牵制苏联的作用。因此,虽然日本要求德国予以声援,但在战争的头半年德国基本保持了中立,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继续在中国服务,德华贸易照常进行。在陶德曼调停中,德国基本上是不偏不倚地传递信息。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对华政策发生逆转,先后采取了承认“满州国”、撤回军事顾问、禁止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等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德关系最终断绝。

法属印支与中国唇齿相依,法国是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但法国政府慑于日本的淫威,不顾中法间有关条约的规定,明令禁止中国假道越南运输物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印支当局还是给予了便利。维希政府成立后,对日本态度更加妥协,竟至允许日本使用印支作为进攻中国的基地,并与汪伪傀儡政权勾勾搭搭。1943 年 8 月中法正式断交。

在抗日战争的头两三年中,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苏联的巨额贷款、军火、军事顾问、飞行员在抗战初年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这样做,既是援助中国,也是保卫自己,日本侵略者不能从中国战场腾出手来,其向北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稍后,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伪满州国,这给战时两国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战争末期,苏联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提出条件,要求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并取得美国同意,达成雅尔塔秘密协定,接着又按照协定框架签订中苏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权益。

这是对中国刚刚取得的大国地位的辛辣讽刺,说明美、苏等国实际上并没有把中国当大国看待,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很不完全、很不牢固的,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中苏关系中的新疆问题,牵涉到主权、民族和一系列实际利益,是一个需要审慎地进行历史考察的问题。

美、英两国的对华关系颇有相似之处。两国在中国都有巨大利益,日本侵华自然有损两国的这种利益,但在中国抗战之初,两国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对日妥协倾向。英国的这种倾向又比美国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张伯伦内阁对法西斯的软弱,英国在欧洲自顾不暇,美国国内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美日经贸利益对美国经济复兴的重要性,等等,不管怎样,两国都做了一些有损中国抗战的事情。但日本明明白白地宣称要排斥美、英势力,要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且随时准备向东南亚进犯,这就迫使美、英两国的政策逐渐转向援华制日。但美、英对中日战争的政策受到它们“欧洲第一、大西洋第一”的总战略的制约,以致美国一度曾考虑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推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珍珠港事变后,美、英与中国结盟,在此后的三年半中,中国与美、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盟国之间的关系,两国都对中国进行财政援助,两国都废止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两国与中国一起签订了一系列庄严的国际宣言,支持中国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的崇高目的。但是,中国与美、英之间近一个世纪的旧关系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美国在雅尔塔背着中国将中国利益私相授予苏联,英国在谈判新约时拒绝讨论归还九龙租借地及坚持香港受降权便是最突出的例子。

中、美、英盟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缅甸战役有关的。由于三国各有自己的利益和战略考虑,由于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美英之间、中英之间三年间在缅甸战役问题上进行了持久的反复的辩论甚至争吵,中美关系也曾经三度出现危机,这与中、美

两国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形成强烈反差。^①

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概括起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争取外国援华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除了这一条,还要加上一条: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而所有这些外交活动又是以美国为重心的。虽然抗战初期对华援助主要来自苏联,但这不能消除蒋介石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怀疑。他认为美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遂积极争取美国给予财政援助,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推动美国在远东起领导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一再表示,他在战时和战后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而在整个抗战期间,美国给予中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最多,美国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支持最卖力。美国战后要在远东建立它治下的和平,建立它的势力范围,需要中国作它的伙伴,成为这里主要的稳定因素,国民政府乐于承当这样的角色。正是通过战时的合作,基于战时和战后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建立了堪称特殊的关系。美国已经离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后者也离不开前者扶助。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不是在别的时期形成的,而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起来的。

中美关系不同于中国与别的国家关系的一个特点是:美国在战时已经介入了国共两党的纠纷,国共两党都明确地意识到,美国将对中国战后的政治发展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力图让美国全心全意地支持它,共产党力图运用美国影响促使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使战后中国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当战争还在进行时,美国是不希望中国因内部分裂而削弱抗日力量的,中共对美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毕竟美国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同利益太多,关系太深,因此到了战争末期,它的对华政策就逐渐由支持蒋容共抗日转变为片面支持蒋介石,种下了日后中美关系恶化的祸根。

^① 见拙文:《缅甸战役与中美英关系》,《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

以上是编者在编辑本卷资料时的一些最基本的想法。

本卷编者的分工是：

王建朗：第一、三、五章，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七章第一、二、三节；

杨奎松：第四、十二、十三章；

李嘉谷：第六、十一章；

齐福霖：第二章第三、四、五、六节；

葛夫平：第七章第四、五、六节；

陶文钊：第八、九、十、十四、十五章。

陶文钊

1996年10月

本卷编辑说明

本卷收录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一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关系的文献资料。除收录中文档案资料外,还选译了较多的英文、日文、俄文档案资料,其中有已公开出版的,有未公开出版而由编者从有关国家档案馆中搜集的。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限于篇幅,有关资料不能尽收,编者以“存目去文”方式省略,标出文件的篇目,注明出处,但不录内容。

二、录入本卷中文资料中有的地名有了更改,如迪化现名乌鲁木齐,有的地名当时与现在写法不同,如星加坡(新加坡),为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加改动,只在必要时注明。

三、每件中外文资料的小标题,编者根据删繁就简的原则作了改动。

四、为便于读者了解历史背景和有关情况,编者在每章每节之前加了说明。凡在前一章说明中已经介绍过的资料来源,后面的介绍中只提书名,省去作者、编者、版本。

五、为简便起见,本卷对若干主要资料来源采用简称,如:

《中共中央文件》即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有关各卷;《作战经过》即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

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二编《作战经过》，《战时外交》即该书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共活动真相》即该书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美国外交文件》即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有关各卷；《年表及文书》即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下卷等等。

六、中文资料内的数字用法，根据国家语委统一规定进行了改动。

目 录

上 册

前 言	陶文钊 (1)
本卷编辑说明	(1)

一、战争初期的对日交涉与争取国际援助

(一) 中日间的中央交涉与决策	(2)
1. 国民政府外交部与日方的交涉	(3)
2. 国民政府的决策讨论与对日交涉原则	(12)
3. 日本政府的决策及有关活动	(18)
(二) 国际联盟大会	(22)
1. 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干预	(23)
2. 中国决定向国联申诉	(40)
3. 会议进程及会外磋商	(50)
4. 国联通过谴责日本的报告书	(72)
(三) 《九国公约》会议	(83)
1. 列强不想在布鲁塞尔采取强硬行动	(84)
2. 布鲁塞尔会议发表宣言	(93)

3. 会议未采纳积极行动的方针·····	(106)
(四) 中日间的断交宣战问题·····	(116)
1. 中国方面的考虑·····	(116)
2. 日本方面的考虑·····	(123)

二、中日秘密交涉

(一) 最初的秘密接触·····	(143)
1. 近卫派遣“密使”赴华·····	(144)
2. 船津辰一郎使华·····	(151)
(二) 陶德曼调停·····	(155)
1. 日本希望德国出面调停·····	(156)
2. 日本提出第一次条件·····	(163)
3. 日本提出第二次条件·····	(173)
4. 调停失败·····	(181)
(三) 宇垣、孔祥熙秘密交涉·····	(192)
1. 孔祥熙与萱野长知的来往·····	(193)
(1) 贾存德和萱野长知的联系·····	(193)
(2) 萱野转告日本的和谈条件·····	(196)
2. 中村与乔辅三密谈·····	(198)
(1) 张群、宇垣互电商谈和平交涉·····	(198)
(2) 中村与乔辅三的预备会谈·····	(199)
(3) 中村与乔辅三的正式会谈·····	(202)
(四) 所谓桐工作·····	(209)
1. 欧战爆发后日军与重庆积极接触·····	(209)
(1) 同重庆直接商谈“和平”的意义·····	(210)
(2) 铃木卓尔与“宋子良”的接触·····	(212)
2. 香港会谈·····	(212)

3. 澳门会议·····	(222)
4. 汪精卫等对桐工作的参与及反对·····	(230)
5. 巨头会谈的酝酿及桐工作的失败·····	(237)
(五) 其他“和平工作”·····	(248)
1. 司徒雷登工作·····	(249)
(1) 1939 年 ·····	(249)
(2) 1940 年 ·····	(250)
(3) 1945 年 ·····	(254)
2. 钱永铭路线·····	(255)
(1) 今井武夫的记载 ·····	(256)
(2) 船津辰一郎日记 ·····	(258)
3. 缪斌工作·····	(258)
(1) 缪斌工作的背景 ·····	(259)
(2) 缪斌提出和平方案 ·····	(259)
(3) 日本最高当局审议缪斌工作及其结局 ·····	(259)

三、中美关系之一(1937 年—1939 年)

(一) 推动美国政策转变·····	(261)
1. 美国不愿卷入中日冲突·····	(262)
(1) 美国谨慎地“恪守中立”·····	(262)
(2) “帕奈号”事件 ·····	(274)
2. 中国呼吁美国援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新思考·····	(281)
(1) 中国要求美国援华 ·····	(282)
(2) 美国对中国抗战的重新思考 ·····	(290)
3. 反击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论·····	(294)
(1) 美国重申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 ·····	(295)
(2) 日本提出“东亚新秩序”论 ·····	(299)

(3)中、美反击“东亚新秩序”论	(306)
4. 推动美国在远东发挥领导作用	(313)
(1)希望美国推动中、英、法军事合作	(314)
(2)要求美国反对英、法妥协倾向	(317)
(二)争取美国的财政援助	(326)
1. 美国购买中国白银	(327)
2. 中美桐油借款	(333)
(1)借款意向的达成	(333)
(2)借款的实现	(341)
(3)中国要求新借款	(349)
(三)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与制裁日本	(351)
1. 美国对日实行航空器材的“道义禁运”	(352)
2. 中立法修改之争	(356)
(1)关于毕特门提案的辩论	(356)
(2)关于白鲁姆提案的辩论	(364)
(3)欧战爆发后的辩论	(371)
3. 美国宣布中止美日商约	(374)
(1)美国考虑采取进一步的禁运措施	(374)
(2)美国中止美日商约	(385)
(3)美国售日军事物资统计	(391)

四、中美关系之二(1940年—1941年)

(一)美国财政援华	(398)
1. 华锡借款	(398)
2. 钨砂借款	(408)
3. 中国呼吁军事合作	(425)
4. 金属借款	(434)